

黄岩文史资料

胡克敏



第十九期

政协浙江省黄岩区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黄岩文史资料

第十九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九年八月

EA78/44
政协黄岩区第十届委员会

学习和文史委员会名单

主 任:梁永庚

副主任:枣贤玺 叶富增 屠荣彪

顾 问:尤伯翔

委 员:王红峰 沈 雷 杨云湘 赵颂平
符艺楠 郑良贵 施慧勇 毛国政
楼云虎

本会地址:浙江省黄岩区府大院内

邮政编码:318020 电话:0576-4222984 4225475

前 言

政协征集文史资料为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资料。其目的是存史、资政与教化。黄岩政协征集文史资料自1984年起步以来,承各方支持,来稿踊跃,已出版二十余册,计两百数十万字。今后征集重点,时限当侧重建国以来的五十周年。这五十年,黄岩发展迅速,成绩辉煌;当然也有引为教训的情事。敬盼海内外同乡及历届政协委员与各界人士,本“三亲”原则,广搜博采,拨冗赐稿!

本期人物资料,不少为国内外名流。如杜勇为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秘书,陈方允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朱有琳为我国当代教育家等。周炳琳教授是著名的爱国进步人士,在旧中国,他与闻一多教授等一道,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帝反蒋的学生运动一边,为求国家之独立和民主奋斗了大半生。他的夫人魏璧女士为早期新民学会会员,与向警予、蔡畅等参加革命。所附张友仁教授辑注资料,更为难得。王杰夫先生,是我区早期在外的将领之一,参加过民初的讨袁护国等战争。他英年早逝,且多在秦陇供职,其生平鲜为人知,故选辑之。

因本刊人力单薄,选编资料,定多不当,错误之处有所难免。敬请指正!

台州市黄岩区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9年8月

目 录

多边外交杂记·····	杜 勇(1)
著名航天测控专家陈芳允·····	胡士弘(21)
周炳琳教授与闻一多教授·····	张友仁(32)
魏璧女士事略·····	周浩博(46)
附:张友仁教授辑注的新民学会文献中的魏璧女士	
我所知道的於达将军·····	张友仁(54)
朱有祚教授和《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尤伯翔(60)
我的回忆·····	王天俊(63)
王杰夫先生传略·····	王克安(77)
热心教育事业的老人——柯保平先生·····	张岳透(80)
革命两姐妹的童年生活·····	赵颂平(83)
忆留美之初·····	林 珂(86)
朱幼棣远征南极·····	赵颂平(107)
黄岩临近解放时所知·····	尤伯翔(111)
解放前黄岩“抽壮丁”纪实·····	钱梅荪(115)
“设计大师”朱有玠诗选·····	伯翔辑录(120)
忆母舅王炳辰及其纪事诗·····	鲁崇道(124)
路桥旧时节日的风俗·····	阮孔棠(127)
黄岩一些地名的来历·····	陈璧光(137)

多 边 外 交 杂 记

杜 勇

编者按：

本文作者杜勇是北京大学英语系离休教授杜秉正的女儿。杜秉正教授黄岩院桥人。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在黄岩中学任教多年。

杜勇原名杜月娥，1932年生，黄岩解放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改名杜甬，曾参加抗美援朝。1954年转业后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1959年进外交部，又改名杜勇。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处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等秘书。她先后40多次出席联合国有关的国际会议。现为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中国组织委员会委员兼特别助理。

本文曾刊载于《女外交官》，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年2月版，由其母郑锦芳女士寄来。谨致谢意！

我16岁参加解放军，当过文工队员，后来又当了志愿军，参加了抗美援朝。从1949年参军到1954年转业，我在部队经历了近五年战斗生活的锻炼，这对我以后的成长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部队是我开始社会生活的第一课堂，它不但帮助我培养了比较乐观、开朗和敢于迎接困难的性格，而且还使我从小病弱的身体健壮起来。

1954年7月，在朝鲜停战一年以后，我怀着建设祖国的强烈愿望回到祖国，并考上了上海外语学院。我当时的愿望是毕

业后当一名外语老师。可没想到,组织上把我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设计院当了俄语翻译。一年后,又把我调到外交部工作。记得我到外交部干部司报到时,还穿一身军服,梳两条辫子。干部司找我谈话的是一位女同志,她看我这个模样,全然不像搞外交工作的,倒像一名部队文工队员。谈完工作后,我起身想走,她叫住我,说等一等,并把我从头到脚看了看,亲切地对我说,组织上这次派你到驻丹麦大使馆工作,梳两条辫子不行,头发还得烫一烫;在外交场合,要穿旗袍,还要穿高跟鞋。我听了,觉得这个变化可真不小。我习惯留两条辫子,也很喜爱穿军服,在上海外语学院四年,我从未脱下过军服,并以此为荣。这一下子,生活上要来个 180 度大转弯,实在很不习惯。然而,作为军人出身的我,当时的心态是服从组织分配第一,组织上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习惯,只好慢慢适应。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外交生涯。初期,我搞双边外交,先后经管过丹麦、法国和瑞士事务。自 1979 年起,我被调到多边外交工作岗位,一直到 1991 年。

我这里讲的“多边外交”是指我国与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国际专门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等)之间的关系,其中主要是指我国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双边外交”是指两国之间的关系,如中国与丹麦、中国与瑞士、中国与法国等等。虽然我参加多边外交工作时,已有多边外交工作的经验,但对我来说很多工作还是陌生的,因此还得从头学起。十多年来,经过不断的学习和锻炼,我对这个领域的工作,逐步地熟悉了起来。

初 次 上 阵

1980 年初,讨论修改《联合国宪章》的会议在日内瓦万国宫

举行。组织上让我参加了这个会议。我既对《联合国宪章》缺乏研究,又是初次上阵,心中无数,只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出席了会议。有一天讨论的议题是《联合国宪章》第六章:争端之和平解决。碰巧我们代表团团长因事未来出席会议,中国席位上只有我们两名女代表。没想到,我们刚一坐下,苏联代表就借题发挥,联系我国对越自卫反击战问题,气势汹汹地指责我国破坏《联合国宪章》,说我们对越南发动战争,是国际法所不能容忍的……顿时,会场气氛变得十分紧张,所有与会代表都把眼睛转向中国席位。我们两人都缺乏这样的辩论经验,心里很紧张,有些不知所措。幸好我们带了我国政府有关此问题的声明,于是我们便根据声明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反击。当时我们引用了古语“树欲静而风不止”来说明我们的自卫反击完全是不得已的。会后,一位外国女代表还对我们的发言表示很赞赏。不过,我们却总觉得有些后怕,感到如果不事先作好充分准备,不仅会出洋相,而且会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所以以后一定要吸取教训,而绝不能存侥幸心理。这可说是我受到一次“启蒙教育”。

我参加了印支难民国际会议

1979年,当印支难民外流问题日趋严重时,领导上分配我经管联合国难民事务,使我有机会参加了1979年7月20日至21日在日内瓦万国宫召开的印支难民国际会议工作。这次会议是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提议下,由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召开的一次部长级会议,包括我国在内的67个国家派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大型的国际会议,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鲜,因而留下一些难忘的回忆。

这是一个斗争十分激烈的国际会议。越南在前苏联的支持下,态度蛮横。它先是竭力反对召开这次会议,咒骂这是“卑鄙的阴谋”,接着又叫嚷会议应只谈“人道援助,”不谈政治,并以金边政权代表必须有合法席位作为它出席会议的先决条件,但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越南当局最后还是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瓦尔德海姆秘书长在开幕词中指出:“那些被扔到水里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幽灵,以及那些在陆上的被抛弃在饥饿和失望中的人们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说:“在已过去的四年中,印度支那有 100 多万人离开了他们的国家。最近几个月来,新的难民和无家可归的人正在急剧地增加,人们都意识到我们正在谈的问题有其政治根源,如同别的难民情况一样,这一问题来源于深刻的政治和历史的原因。”会上许多国家的代表都对越南驱赶难民的暴行进行了谴责。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还把越南此种行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驱赶犹太人进行了对比。我国副外长章文晋、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和菲律宾外长罗慕洛等都在会上作了发言。这些发言,除指责越南的暴行外,还分析了产生印支难民的政治根源。正当章文晋副外长发言谈越南暴行时,越南代表拿起桌上的国名标签牌拍打桌子,要求发言答辩。这时,主席瓦尔德海姆当作没有听见,不予理睬。章文晋副外长仍以洪亮的嗓音发言。越南代表见此情景,气急败坏地又敲牌,又叫喊,严重地扰乱了会场的秩序。这时,主席不得不请发言者暂停,让越南代表表达对会议进程的意见。待听完越南代表发言后,主席断然拒绝了他们提出的要求,指出:“本次会议不拟沿用联合国会议允许在会上答辩的做法,要答辩可散发书面材料。现在我请中国代表继续发言。”越南代表无可奈何,只好作罢。在会议大厅二楼记者席位上的几百名记者纷纷拍下这一记载中国代表伸张正义和越南代表狼狈不堪的历史镜头。

当章文晋副外长得知当晚瑞士电视台以特写镜头播放了他的发言时，他风趣地对我们说：今天是越南代表帮了我的忙，让我当了瑞士电视台的明星。

在这次会议期间，章文晋副外长的卓越的外交才干和风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章文晋副外长一到日内瓦，就展开穿梭外交，对英、美、法及东盟等国代表团团长一一进行了拜会，以便与他们达成共识。他一再指出，只谈人道援助，不谈产生难民的根源，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我国的这一立场，被许多国家所接受，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对工作，他精益求精。按照常规的做法，团长的发言稿，一经译成英文后，就不再变动，新华社记者便可照此发消息了。但章副部长不允许这样做。他对我们说，这稿子不是最后定稿，我还得根据会场气氛进行修改。即便我已开始发言，也不能说就已最后定稿，我还可能在发言过程中进行改动。只有等我发完言，走下讲台时，新华社记者才能对外发消息。这席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这告诉我们，做事不能贪图方便，发言一定要有针对性，特别是就国际焦点问题进行斗争时，由于情况不断变化，与会者应随时掌握会议动向，并应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新情况，来修改自己的发言。不仅如此，他还很注意文风。他对我们说：“我听了与会不少国家代表的发言，有的发言稿写得生动、形象，能吸引听众，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搞多边外交的人，都懂得写发言稿的重要性，但要写得好很不容易，因为这也是一种艺术。它不仅要求有很强的政策性，而且还要用形象的实例和生动的语言来表达。有时一篇精彩的发言，能打动在场的几百上千名听众的心，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惜，在联合国讲台上，这样的发言并不多。多数发言枯燥无味，有的甚至是老调重弹。我刚搞多边外交时，也不会写发言稿，总是照过去发言稿的格式

往里套。在以后的十几年里,我总是以章文晋副部长对发言稿的要求来要求自己,尽管自己的水平有限,写不了高水平的发言稿,但写稿的态度是极认真的,总是写前多了解情况,并阅读有关文件,尽量使发言有针对性,做到有的放矢。

第一次出席联合国大会

1984年9月,外交部国际司派我参加了第39届联合国大会。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增长见识的机会。接到这一任务后,我很激励,也很高兴。过去,我一直在西欧地区工作,还从未到过美国。我从事多边外交工作已有多,虽说在日内瓦工作过,但日内瓦办事处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联合国总部到底是什么样的?联合国大会是怎么开的?我还未亲身经历过。我想,我一定要很好地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认真学习,努力工作。于是,我积极地进行了会前的准备工作。

根据业务分工,我的主要任务是去参加联合国第三委员会会议。联合国是个庞大的机构,每届联合国大会要审议的议题总有一百四五十项之多,可说包罗万象。为了便于讨论,联合国按问题的性质下设了七个专门委员会:第一委员会讨论裁军问题;第二委员会讨论经济问题;第三委员会(以下简称三委),也就是我要参加的委员会,讨论有关难民、人权、毒品、妇女、青年、老年人、残疾人和预防犯罪等社会问题;第四委员会讨论反对殖民主义问题;第五委员会讨论联合国的行政和预算问题;第六委员会是讨论法律问题。还有一个特别政治委员会,是讨论特别政治和新闻等问题的(1993年联合国为精简会议,节约开支,已将特别政治委员会与第四委员会合并)。听说,三委是最热闹的一个委员会,也是斗争比较激烈的一个委员会,因为有人权问题

的议题。为了使自己对要参加的委员会有所了解,我把第38届联合国大会三委的简要记录(约800页)和报告书(内载有三委讨论情况及三委通过的70多个决议)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并按问题做了详细笔记。通过阅读上述文件和有关资料,我对每个问题的焦点及各方态度均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我还认真研究了我国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和观点,初步做到了心中有数。

我国出席第39届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由60多人组成,其中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人员占一半以上,国内去的有20人左右。代表团团长是当时的外交部长吴学谦。我和国际司其他三位同志是作为“先遣部队”于9月13日离京去纽约的。到纽约后,我们立即投入紧张的会前准备工作,并协助了解有关会议情况。准备工作包括熟悉联合国和当地环境在内。我到纽约后先请常驻团两位熟人作向导去参观联合国总部。从代表团到联合国总部坐车约需半小时。联合国总部大楼外形像一个火柴盒子,共有39层,矗立在纽约东河之滨,一排图案与色彩各异的联合国会员国国旗,迎风飘扬在大楼前的广场上。为安全起见,联合国规定,人或车进入大门时都必须出示证件。当警卫看清我们乘坐的是外交车时,立即为我们放行。进入办公大楼,又有警卫再次检查出入证。我们从大楼底层开始参观。这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会议室,各委员会的会议都在这一层举行。大会议室除有100多个成员国代表的席位外,还有观察员和听众席。在每个代表席位上,都备有同声传译用的耳机和供代表发言用的话筒。在有些大会议室的代表席位上,还装有供通过决议草案时使用的绿、红、黄三种电钮:按绿色电钮是投赞成票,按红色电钮是投反对票,按黄色电钮是投弃权票。我对这些都很感兴趣,而且看得很认真,因为在以后开会时我都必须会使用这些工具。

在一层,我们参观了图书馆和餐厅。这个以已故联合国秘

书长哈马舍尔德命名的图书馆,是为联合国工作人员和各成员国服务的。里边藏有联合国成立以来的各种资料,包括各种会议通过的决议、宣言、公约和各国代表在历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的文字稿等等。该图书馆全部使用电脑编号,查找资料很方便,是一个颇受大家欢迎的图书馆。这里的快餐厅,面向联合国工作人员和各国代表团成员,其价格比外边饭馆便宜得多。他们采取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每天吸引了来自五大洲的大批顾客。此外,还有供宴请的餐厅。

二层是我想参观的重点,因为我事先打听到,举世闻名的安理会和大会的会议厅都在这一层。不巧,那天这两个会场都不开会,门紧锁着,好在,我们还要在此开两个多月的会,以后总会有参观的机会。最后,我们到了代表休息厅。它位于大会厅和安理会会议厅之间。这是个宽敞、明亮的休息厅。它不仅是代表们休息的地方,而且是代表们开展“走廊外交”、交流会议情报的地方。会议期间,每天都会有许多外交官到这里来探听消息、会见朋友……它是联合国总部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场所。在这里有一件非常吸引人的墙饰,那就是我国政府于1974年10月赠送给联合国的长城挂毯。它挂在这个休息厅最醒目的地方——大厅正中的墙上。这幅由天津地毯厂制作的高5米、宽10米、重280公斤的、色彩绚丽的巨幅挂毯,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它不仅向世界各国代表和来联合国参观的旅游者展示了雄伟的万里长城和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而且还展示了我国精美的手工艺艺术。凡看过这幅挂毯的人,无不为之赞叹不已。与这幅挂毯同时赠送给联合国的另一件珍贵礼物是一个由八个象牙组成的、重量为300公斤的、反映中国人民建设成昆铁路面貌的精美的象牙雕刻。

按惯例,联合国大会于每年9月第三周的星期二开幕,12

月中旬结束,历时三个多月。不用说,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举世瞩目。不论从会议的规模或是出席会议的规格来看,都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我在日内瓦工作时曾出席过几个重要的国际会议,如印支难民国际会议、向柬埔寨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救济的国际会议、非洲难民国际会议等,但这些会议远不能与联合国大会相比。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各国首席代表大多数是部长级官员(多数为外交部长),也有不少是国家元首或其他政府首脑。这些人云集纽约,除了要在大会上发言外,还要在会外广泛地开展双边或多边外交活动。因而,这一时期是国际上外交活动最频繁、最活跃的时期。每年,我国代表团团长在纽约逗留的时间一般都在10天左右(各国代表团团长大致也这样,或停留更短)。在短短的时间里,他们往往要会见几十位各国代表团团长。这样快速、高效率的外交,在平时是很难做到的。

联合国大会期间,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大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了。记得那年在大会上发言的有美国总统里根、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和一些拉美国家的元首。我对这些发言都很感兴趣,但限于时间,只能有选择地听一些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发言。现在回忆较清楚的是听里根总统的发言。那天,常驻团派车送我们去会场。但汽车必须在上午9点前到达联合国,因9点后,有关街道将为里根总统的安全实行戒严。需要早到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去占个位置——去晚了就没有座位,得站着听,甚至要到会场外看电视实况转播。幸好,我们去得较早,当我们进会场时,二楼听众席上还没有多少人,我找了个好位置坐下,看看当天的《纽约时报》,耐心地等着。不到10点,听众席上就已座无虚席。再看一楼会议大厅,人们也都在加快步伐走进会场。联合国会议一般是上午10点半开始,等到里根总统讲话时,整个会议大厅已被挤得水泄不通。两旁的听众一个挨一个地站着,

像一道坚固的人墙。也许是由于里根总统年轻时曾当过电影演员的缘故,他讲话时口齿特别清楚,节奏掌握得也很好,加之讲稿的一些段落写得比较生动,所以他的讲话,不管讲稿内容如何,还是很受欢迎的,赢得了不少掌声。根据联合国礼仪,凡国家元首到联合国发表演讲,步入会场讲台时,联合国秘书长和大会主席要陪同出场,讲完话,他们还要亲自送元首退出会场。所以,里根发言后,大会主席不得不宣布休会5分钟。此时,整个会场乱成一团,听众们纷纷往外散去。我们也趁此离开了会场。

39届联大第三委员会讨论了多方面的问题:在青年议题下,讨论国际青年参与、发展、和平(1985年);在妇女议题下,讨论内罗毕世界妇女大会(1985年);在预防犯罪议题下,讨论第七次联合预防犯罪和犯人待遇大会(1985年);在残疾人议题下,讨论联合国残疾人十年(1983—1992年);在老龄人议题下,讨论老龄人维也纳国际行动计划。这些议题都有较实际的内容,我们代表团在三委分别就这些议题作了发言。与此同时,我们还广泛地开展了交友工作并参与了决议草案的磋商。在联合国,讲英语的最多,其次也有较多的人说法语,特别是许多非洲法语国家的外交官。我学过这两种语言,这使我在三委能较广泛地结识许多人,及时了解会议进展的情况。俗话说,情况明,决心大。因为我们与各国外交人员有较广泛的联系,能较全面地了解情况,因而工作起来也就比较大胆。一名加拿大代表曾对我国代表团一名成员说:“过去,在三委很少听到中国的声音,现在到处可以看到中国代表所起的作用。”通过这届联大,我受到了鼓舞,看到自己所担负的工作为国际社会所重视,从而坚定了我对搞好工作的信心。回国后,我把在这届联大三委的所见所闻分别向共青团中央、中国老龄委员会和残疾人联合会作了详细汇报。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贾棣镔、老龄委员会副主

任魏恒仓等领导成员以及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秘书长王鲁光等听取了我的汇报。他们说我的汇报内容很具体,从中可以看到国际上对这些问题都比较关心,而且别的国家有许多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当时,老龄和残疾人事业在我国开展不多,在这些方面我们与国外接触也比较少。因此,我把许多联合国成员国在会上所谈的一些观点和经验汇报给他们,对进一步推动我国在这些方面的工作很有好处。

对联合国选举的感想

联合国的选举五花八门:有时是为了选出担任某个职务的人员,有时是为了选出某国际机构的成员国。各种选举依其重要程度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层次”,分别在不同的范围内进行。如对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法院大法官等重要职位的选举,以及对一些重要机构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员国的选举,都要在联合国大会进行;而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下属各委员会(人权委员会、妇女地位委员会、麻醉药品委员会、社会发展委员会、人口委员会等机构)成员国的选举,则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一届常会进行(从1992年起,改为在经济理事会组织会议上进行)。为体现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联合国每个成员国都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此,每个成员国为了争取竞选的成功,都必须与其它成员国进行广泛的接触,以寻求他们的支持。

我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期间(1986年10月至1991年1月)曾四次出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一届常会。会上除审议理事会下属人权委员会、妇女地位委员会、麻醉药品委员会及社会发展委员会等职司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外,还有一项重要议题是选举各职司委员会成员国(联合国各委员会每年有三分之一成

员国任期届满,届时需选举产生新的成员国)。许多国家都为能成这样的成员国而下大力气参加选举。有一个国家的外交官曾对我说过,该国如在重要机构选举中落选,外交部和议会将唯大是问,有时大使甚至有丢官的危险,可见其重视的程度。

客观地说,我国竞选联合国各机构,一般较为顺利。我国自1971年恢复联合国席位以来,在联合国机构成员国选举中从未落选过。尽管如此,我们对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举行的各项选举仍不敢掉以轻心。1988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一届常会有关机构的选举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那一年,我国同时竞选人权委员会和妇女地位委员会两个机构的席位。一般认为,在联合国社会领域,这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机构,参加竞选的国家比较多,要在这两个机构的竞选中同时当选是相当困难的。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两个机构中,我国都以48票当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共有54个成员国)。与我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虽只参加了妇女地位委员会一个机构的竞选,却落选了,而另一个超级大国竞选人权委员会,也险些落选。还有一个西方国家竞选人权委员会,原估计可得40多票,当选是毫无问题的,结果只得19票,也落选了。当会议主席宣布选举结果后,许多国家代表纷纷向我们表示祝贺。有的代表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有的代表说:“真了不起,只有中国才有此可能。”有的代表问我:“你们有什么‘法宝’,每次都当选,而这次竟如此突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提问我怔住了。我想了想,随口说了一句:“我们没有什么‘法宝’。如说有法宝的话,那就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大家都支持我们。”在整个竞选过程中,许多国家都表示支持我们,尤其是非洲国家,对我们非常热情和友好。

在国际会议上,我很愿意和非洲国家代表交朋友。我们彼此之间感到很谈得来,因为我们有許多共同点。在竞选过程中,